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 制度变迁的阶段划分、变迁特征及其启示

田丽敏¹ 李赞² 熊文¹

(1.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1100; 2. 天津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科学学院, 天津 301636)

摘要: 总结历史旨在镜鉴未来,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水平, 理顺其时代脉络、分析其改革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 对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阶段划分与特征表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启示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可以认为是一场制度变迁。按照制度的供需关系,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可分为准备期、起步期、暂缓期、突破期和深化期五个阶段。其特征主要表现为: 变迁方向上, 市场开放度逐渐提高, 政府主导路径依赖痕迹显著; 变迁模式上, 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与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结合所致; 变迁动因上, 相关利益主体围绕自身利益展开的博弈为根本因素, 内因和外因共同发挥作用; 变迁节奏上, 表现为弹性式的渐进边际调整。最后提出: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应对举国体制给予辩证扬弃, 着重围绕市场这一发展主线, 改革进程中应彰显一定的人文关怀并以各方利益的共赢共享为其诉求。

关键词: 中国竞技体育; 市场化; 制度变迁; 阶段; 特征;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05-0023-05

DOI:10.15930/j.cnki.wtxb.2019.05.004

Marketization Reform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Stages,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IAN Limin¹, LI Zan², XIONG Wen¹

(1. College of P. E.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 Shanghai 201100, China;

2. School of Sport Training Science, Tianjin Univ. of Sport, Tianjin 301636, China)

Abstract: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helps further the reform the competitive sports market. The analysis of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showed that the competitive market experienced the preparatory, initial, bottleneck, acceleration and deepening stages. The market became more transparent and it was still mainly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was pushed forward by the top-down control, bottom-up needs and game between the stakeholders through elastic progressive margin adjustment. The reform of the competitive market should centre around the government dominant system an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humanistic concern and of win-win cooperation based on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of China; market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stage; characteristics; enlightenment

审视以美国为首的竞技体育强国, 市场配置是竞技体育资源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途径。回顾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路途, 虽然在政府的大包大揽下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但时下依托市场资源促进竞体发展已势不

可挡。因此, 对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而言, 研究其市场化改革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制度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进程中可谓举足轻重, 制度是指正式的规则, 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以及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 不同时期制度所表现出的更替, 就是制度变迁^[2]。通过研究制度变迁的表现特征,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提供较为客观的认知基础。审视现有相关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探讨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论述还不够充分, 且阶段划分参差不齐,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认知偏差。基于理论研究的不足以及实

收稿日期: 2019-03-05; 修回日期: 2019-04-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TY077)。

第一作者简介: 田丽敏(1993-), 女, 山西晋中人, 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运动训练理论。

通讯作者简介: 李赞(1975-), 男, 河南鹤壁人,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

践探索的需求,笔者从制度变迁角度出发,对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阶段划分和特征表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期为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为进一步解释和匡正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路径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1 制度审视: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是一场制度变迁

1.1 制度创新: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实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创新^[3]。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也理应为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它是基于理论创新基础上对其所进行的规范表达以及再创新^[4]。审视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其遵循了制度创新的一般原则,是对竞技体育市场化理论给予规范表达与再创新的过程。1993年原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可视为我国竞技体育迈向市场化的制度起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下,竞技体育顺应时代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一文件的出台,以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研究为基奠,对当时所存的不利制度进行了批判与革新,结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状况,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制度规范。例如,在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体制建设方面,《意见》提出,行政机构对运动项目的管理要从直接向间接转变,逐步实现运动项目的协会管理。这一提法,是对旧有制度的革新,迎合了时代发展潮流,同时也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体现。再如,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在市场具有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提出我国竞技体育也要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内容的制定和出台,是对竞技体育发展进程中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基础性地位这一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对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延伸。因此,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每一次制度推进都是基于一定理论基础对原有制度的创新。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促使竞技体育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的作用于实践操作,从而不断满足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动态需求。

1.2 制度变迁: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创新的演进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而又被打破的过程^[5]。因此,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创新的不断演进构成了制度变迁。1992年邓小平“论资社”的著名论断打开了我国市场化的大门,在此背景下,1993年,原国家体委出台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改革的总目标指出:要改

变原来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单纯依靠国家及行政手段发展体育的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的体育体制以及运行机制。该制度的确立,实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从无到有的转变,是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之后,随着竞技体育本身以及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原有的制度不断得以更新,新的制度不断获得确立,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在新旧制度的不断更替下取得了长足发展。例如,1996年《进一步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就是基于1994年《关于加强体育市场管理的通知》对后者给予的改革和创新,旨在克服体育市场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不利因素。如此看来,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阶段性完善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制度变迁的特征。

2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阶段划分

供求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变迁的基本方法,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吻合时,制度呈现均衡状态;而当其发生矛盾时,制度则表现为非均衡,此时需要给予一定的改革和创新,使两者之间实现新一轮的均衡和稳定。供需失衡与再均衡的矛盾运动促使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实现一次次制度变迁。因此,本研究拟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为切入视角对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进行阶段划分。

2.1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准备期(1978-1991年)

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重返体坛的迫切愿望为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埋下了制度新需求的伏笔。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的一个核心内容便是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领域,会议明确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经济体制的突出表现,必须予以改革,要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领导下,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下放至各个企业。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就是要逐步实现依靠市场获得自身发展,通过市场中的相关企业满足竞技体育发展的资源需求。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提法,使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成为可能。在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下,我国竞技体育随之产生新的发展需求。运动项目协会试点以及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成立,是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准备期的供给表现。

2.2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起步期(1992-2000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国奥队冲击

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失败正式点燃了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制度需求。1992年邓小平“论资论社”的南巡讲话奠定了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基础,指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市场是调节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同年十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被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将会依托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体系得以实现。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作出配套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6]。以足球市场化改革的敲定为伊始,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在制度上给予了明确规定。1993年国家体委研制并下发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提出力争在20世纪末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新体制。该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我国体育市场化改革步入正轨。

2.3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暂缓期(2001-2008年)

北京奥运的特殊需求导致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推进的暂时紧缩。特殊时期,我国对竞技体育赋予了特殊发展需求,例如洗刷耻辱的民族需求、提升影响的政治需求等,而新需求与旧制度的不相适宜必然会导致制度失衡现象的产生。为了及时满足发展需求以及规避制度失衡带来的诸多弊端,国家体育总局《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作为新的重要的制度供给应运而生。《纲要》在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上强化奥运战略,指出:重点是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完成好,充分调动全国的体育资源,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攀登世界竞技体育高峰。《意见》作为国务院文件,引言中直指:要努力把北京奥运会办成史上最出色的一届。通过上述文件可以看出政府对承办此届奥运会的重视和决心,是特殊时期对竞技体育的特定制度供给。要想在短时期内集中力量促发展,政府基于其强制性权力具有市场无可比拟的优势。奥运期间,政府确实进一步做出了包揽体育的举措,体育体制改革速度暂时放缓。

2.4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突破期(2009-2012年)

这一时期,竞技体育的政治、历史、文化等需求出现递减。政府简政放权的实际举措以及体育产业发展的进一步推进是这一时期实现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均衡的供给表现。制度供给必须适应制度需求才能实现制度供需的相对均衡,这是制度变迁的内

涵所在。从制度供给来看,这一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制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网球运动员李娜在其自传《独自上场》中曾这样描述: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郑洁等四位运动员终于在中国网协的宣布下可以单飞,作为职业选手,这样的环境以及方式已经足够了^[7]。可见,北京奥运结束后,我国对竞技体育的政府管制有所放松,中国网协的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在市场化改革路途中的进步。2011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在体制建设上,要进一步转变政府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职能,调动社会系统中的多方力量,促进国家与社会一起办的体制形成。要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模式及道路,初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具有清晰产权以及高效运转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机制。

2.5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深化期(2013年之后)

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革新为进一步激活竞技体育市场主体提供了制度条件,促进了竞技体育市场需求的增长。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基于市场需求,有必要进行新一轮的制度供给。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对于商业性质的赛事以及群众性质的赛事一律取消审批流程,政府以监管、管理为主要职责。《意见》的出台和颁布,对于进一步活跃我国体育市场产生了积极作用。2015年,足协的正式脱管成为我国竞技史上的重要一笔,这一开创对于其他运动项目协会的市场化发展能够产生一定的引领作用。2016年《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是对未来五年竞技体育科学发展所制定的专门计划,加快推进职业体育的发展进程是主要目标之一。在主要任务方面,《规划》指出,要改革创新,逐步形成国家、社会合理办的竞技体育新体制;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职业体育发展道路等。这一时期,伴随着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地位的确立,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也在制度上做出进一步呼应,改革进入了深化期。

3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特征分析

3.1 变迁方向:市场整体开放度逐步提高,“政府主导”路径依赖显著

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方向首先体现为市场开放度在整体上的逐渐提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奠定了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基础。1993

年,原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正式启动了市场化改革步伐。基于政治、历史等民族诉求,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意味着我国体育事业将围绕“北京奥运”为核心,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2013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由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进程。《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的印发,使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发展不再单纯追求数量,而是更加关注质量及竞争力。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我国对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政府干预度越来越小。政府主要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建立“负面清单”等手段规范、服务和监管市场,市场开放度逐渐提高。

其次,对“政府主导”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是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方向的又一明显特征。路径依赖是指过去的某种选择对现在、将来所造成的影响,与物理学中的“惯性”相类似^[8]。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多年来都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对竞技体育大包大揽,导致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中对此表现出高度的路径依赖^[9]。虽然路径依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正是基于这一性状,导致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推进缓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

3.2 变迁模式:自上而下的强制与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相结合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模式首先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法律法令和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所导致的制度变迁^[10]。1993年《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是我国竞技体育开启市场化进程的第一部正式文件,该文件是在党和政府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为适应新的经济发展体制而主动出台的体育体制改革的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努力把北京奥运会办成史上最出色的一届;而《2001-2010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又将奥运战略推向了极点,即使在北京奥运会取得极大成功的背景下,运动员单飞等事项也需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方能实现。可以看出,政府在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具有绝对的权力,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是制度变迁模式的典型特征之一。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者其他团体在获利机会的响应下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导致的制度变迁^[10]。1994年万

宝路足球联赛的揭幕,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进程的正式开启,相关研究显示,联赛为各个参赛俱乐部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为了加强市场管理,鼓励和引导竞技体育市场化活动,原国家体委于1994年和1996年分别下发了《关于加强体育市场管理的通知》和《进一步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这些文件的推出,正是在竞技市场影响下所导致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

3.3 变迁动因:内因和外因共同促进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外部动因,首先体现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著名论断开创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河,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于2013年被正式确立。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国家宏观体制改革的影响。其次,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受国外竞技体育强国的影响。审视国外竞技体育强国的发展经验,以美国为典型,职业体育的价值观融合自由教育的培养理念成为美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11]。最后,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还受到历史、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北京奥运期间的政治干预就是典型表现。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相关利益主体围绕自身利益展开博弈所导致的结果。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两个群体:体制内部相关利益集团和体制外部市场获利者,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构成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内部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体制内部既得利益者和体制外部市场获利者之间的相互博弈所产生的矛盾,国家和政府作为制度制定主体,必须对此予以制度干预,从而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

3.4 变迁节奏:弹性式的渐进边际调整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在节奏上表现出明显的弹性特征。1993年原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第一次从制度上对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给予了明确说明。在政策鼓励及利益驱使下,一些个人、企业开始涉足竞技体育。自此,我国竞技体育迈入了市场化改革进程。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基于特殊的政治、历史需求,集中力量促进竞体发展成了这一时期的政策主题。竞技体育在这个阶段带有强烈的民族和政治色彩,市场化改革进程在多种复合效应影响下有所滞缓。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我国

竞技体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市场化改革在制度上被重新提上议程。如此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节奏并非直线式上升,而是依据现实基础,有上升、有滞缓、有回弹,呈现出弹性式的变迁特征。

此外,渐进的边际调整也是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节奏的重要特征。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从改革初期到改革深化期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单从时间维度审视,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至今仍处于不断深化改革进程中。渐进式的调整方案既可以满足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发展的动态需求,又不至于产生大的制度动荡,避免了多种危机的发生。

4 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路径启示

4.1 举国体制: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辩证扬弃

回顾我国竞技体育的整个发展历程,举国体制效应显著,没有举国体制,我国竞技体育很难在短时间取得如此大的进展。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以及市场因素的注入,传统的举国体制已不能满足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需求,而脱离政府管制、完全放手于市场又可能滋生一系列其他矛盾。为此,制度变迁过程中,应对其予以辩证扬弃。对于我国竞技体育来说,一方面,北京奥运会的金牌问鼎将多种效应尤其是政治文化效应发挥至极致,这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完全摒弃举国体制是不理智、也是不现实的。毕竟目前我国某些优势项目,由于市场化程度还不高,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维系。另一方面,在市场对资源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今天,脱离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技体育发展的灵活性。为此,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过程中,应对举国体制予以辩证对待、扬弃发展,走适宜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改革道路。

4.2 市场主导:制度变迁进程中的核心主线

从40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市场路径在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中日益凸显。当下,我国正处于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年代,这为我国竞技体育未来的发展走向提供了基本的宏观政策支持,即按照市场条件、市场规律促进竞技体育的开展。其次,国外竞技体育强国、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竞技体育职业运作的极大成功,为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运营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为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路径启迪。当然,竞技体育的市场导向也有赖于竞技体育所内含的经济价值。市场条件下,经济利益是核心诉求,“经济人”对利益的追

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对竞技体育的市场需求。审视我国竞技体育的制度安排,市场对其的渗透已与日俱增,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强,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将在极大程度上表现出市场主导的特性,政府的作用也应实现由“管”向“治”的转变。

4.3 以人为本:制度变迁进程中的人文诉求

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人文意蕴。过去,在政府主导的时代里,以运动员为核心的竞技主体实现着为国争光的崇高理想。不可否认,正是这种高尚追求、优质美德的存在,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完成短时赶超的重要精神支柱。但在政府主导条件下,过分的强调为国争光、集体主义极易诱发极端的工具理性,即运动员及相关人士的存在是为实现获取金牌这一目标的工具,其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物质。而市场导向下,境况有所缓和。当运动员不再受完全意义上的政府管治时,个体性能将有所释放,价值理性也会随之凸显,与当代社会所倡行的“以人为本”理念相契合。从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的特征来看,基于政府主导的路径依赖以及竞技体育市场发展的不完善,“以人为本”虽有所显露,但程度还较为欠缺。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在制度层面应进一步体现人的发展,彰显人文关怀。

4.4 共赢共享: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利益探寻

谈及市场不可避免的涉及利益,因此,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就不得不考虑利益相关因素,共赢共享应是核心诉求。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安排,其共赢共享可从两个维度予以考虑。其一,政府层和市场层。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不能仅围绕市场利益而展开,不能因其具有一定的市场性质就完全与政府脱离。竞技体育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等功能,当代中国仍然需要竞技体育来促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且这一诉求具有长期性特征。东京奥运会在即,运动健儿优异运动成绩的取得无疑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具有较大的积极效应。其二,投资层和运动员。将竞技体育置于市场环境中,一方面要满足投资方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还应使运动员在市场中能够获得相关利益。例如,运动员为俱乐部比赛,这一过程不仅要有促使运动员获利的机制,还应使投资主体有利可图。因此,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应在制度中体现共赢共享理念。

5 结语

从制度变迁角度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历
(下转第75页)

- 情报学报 2015 32(12):1270-1277.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EB/OL]. 1997.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4/201005/88437.html
- [16] 明宇,司克虎. 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国际体育专利的竞争情报分析[J]. 体育科学 32(9):88-97.
- [17] 宣勇,凌健. “学科”考辨[J]. 高等教育研究 2006 27(4):18-23.
- [18] 《体育概论》编写组. 体育概论[J].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40-43.
- [19] 赵承磊. 生命视域中的体育竞技散议[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5(7):22-25.
- [20] 陈玉忠. 论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0 34(1):25-28.
- [21] 胡小明. 体育休闲论[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32.
- [22] 纪成龙. 学科逻辑起点的问题与体育休闲学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9(3):62-67.
- [23] 付善民. 体育休闲学研究主体领域分析——西方社会学视角下休闲学研究的启示[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9 43(6):72-75.
- [24] 叶文振. 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构想[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46(2):149-154.
- [25] 张晓慧. 对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 教育教学论坛, 2017(52):233-234.
- [26] 冯向东. 张力下的动态平衡:大学中的学科发展机制[J]. 现代大学教育 2002(2):67-71.
- [27] 杨文轩,陈琦. 体育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25-27.
- [28] 谭镜星,曾阳素,陈梦迁. 从学科到学科群:知识分类体系和知识政策的视角[J]. 高等教育研究 2007(7):31-36.
- [29] 胡小明. 体育的价值区域与探索路径[J]. 体育科学, 2007 27(11):9-14.
- [30] 鲁长芬. 体育学科体系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49.
- [31] 胡小明. 体育研究重在实证与应用[J]. 体育与科学, 2013 34(6):1-5.
- [32] 董德龙,刘文明. 归属、规模、规制: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认识——一种学科方向探究[J]. 体育科学 2015 35(3):83-89.

(上接第27页)

程,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实践后,其市场化程度已由准备期进入深化期。须直言,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虽已步入深化期,仍需不断完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主导路径依赖显著、特殊事件的干预效应凸显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挠等因素成为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前行的主要矛盾。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地位的宏观背景下,竞技体育走市场化道路已是必然。为了缓解多方矛盾、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我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推出应力求体现举国体制的辩证扬弃、市场主导的核心主线、以人为本的人文诉求以及共赢共享的利益讨寻。只有依据现实基础并予以多方考量,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改革。

参考文献:

- [1] 贺卫,伍山林. 制度经济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 [2] 鲁鹏. 实践与理论:制度变迁主要流派[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 [3] 洪名勇. 制度经济学[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6.
- [4] 陈朝宗. 制度学理论与我国制度创新实践[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8 8.
- [5]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4.
- [6] 熊晓正,夏思永等.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研究[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28-29.
- [7] 李娜. 独自上场[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8.
- [8] 时晓虹,耿刚德等. “路径依赖”理论新解[J]. 经济学家, 2014(6):53-64.
- [9] 李中.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创新[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2012.
- [10]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
- [11] 彭国强,舒盛芳. 回顾与思考:美国竞技体育成长因素及其特征[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7 36(5):28-35.